Globethics Repository



中文聖經翻譯的歷史回顧和研究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Choi, Kam To Daniel
Publisher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Rights	All rights reserved
Download date	2026-11-10 21:43:14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531

中文圣经翻译的历史回顾和研究

蔡 锦 图

内容提要：本文是对1810年以来新教中文圣经翻译的历史回顾。全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主要段落，提供了新教中文圣经、两约和分卷的历史回顾，包括过去两个世纪在各国圣经公会、图书馆和差会档案馆中，以及记载于中文圣经目录中的藏书。同时也提供一份中文方言圣经的年表。在这些历史材料基础上，第二部分探讨了建立一份详尽的中文圣经译本和版本编目所需考虑的取向。

关键词：中文圣经；圣经翻译；圣经的历史编目

Historical Review and Research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Choi, Kam To Daniel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translation of Protestant Chinese Bible ranging from 1810. The whole study is divided into two sections. The first section is the main part, presents a historical review of the Protestant Chinese Bibles, Testaments and Portions, including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those mentioned in the collections of national bible societies, libraries and mission archives, as well as in catalogues devoted to Chinese Bibles in the last two centuries.Here also offers a chronological list of Chinese Bibles in local dialects. On the basis of these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second section of this paper will consider the approach which will help establish an exhaustive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Chinese Bible versions and editions.

Key words: Chinese Bible; Bible Translation;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Bible

圣经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神圣经典，也是历史上流传最广泛的著作。罗马天主教会、正教会和新教教会，以及拥有相同信仰的基督教派，尽管在某些传统和信念上有差异，却是共同认信以圣经为基础和准则，以此决定他们的信仰和教义。基督教会所认识的圣经，主要是指犹太教的希伯来圣经（即《旧约》），以及《新约》的希腊文正典。随着基督教信仰的传播，圣经也翻译成不同语言。中文圣经翻译历史的最早阶段，就是景教在唐初来中国时开始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元朝和明末，以及新教传教士在清中叶先后来华，也伴随着中文圣经的翻译事工。

新教中文圣经翻译的历史已有200年，对于这些圣经版本的研究和整理，过往是由几个专责圣经翻译和出版的机构进行的，尤其是圣经的编目。至于在圣经和历史学者之间，对于中文圣经翻译的研究论述，大致上可以分为圣经翻译历史、圣经翻译理论，以及对个别译经者或圣经版本的研究等三个取向。就具体研究而言，以上述第一个取向的论述较多，而对于中文圣经翻译理论或个别版本的论述，却是相对较为缺乏；至于中文圣经版本的整理，更为少见，大部分是个别圣经出版或学术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研究机构的成果。[①]由于中文圣经翻译研究有助理解中国基督教神学与教会思想的发展，故此对于上述三者的探讨都极具意义。

新教中文圣经翻译的历史尽管有别于天主教和正教会传统，但新教部分传教士曾参考后两者的译经成果，在历史上实有相连关系。不过由于篇幅所限，本文的讨论只能限于新教版本。本文第一部分是主要段落，略述中文圣经翻译的历史，而所鸟瞰的历史乃从19世纪初迄今。第二部分介绍现存中文圣经版本整理的可行建议方式，尤其集中于对编目的研究和探讨。[②]

一、历史回顾

1.文理译本

早期圣经译本都是文言翻译，传教士称之为"文理"(wenli)译本。最早出版新教中文文理圣经的，是英国浸礼会派驻印度塞兰坡的传教士马殊曼(Joshua Marshman)。马殊曼在一名出生于澳门的亚美尼亚裔青年拉撒(Johannes Lassar)的协助下，于1810年分别出版《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这正好是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在广州出版《使徒行传》的同年，参后)。马殊曼和拉撒的《新约》于1811年完成，1816年出版，《旧约》于1822年完成，同年在印度塞兰坡以活版铅字印刷出版，成为历史上第一部完整出版的中文圣经。1823年，马殊曼和拉撒根据马礼逊译本和希伯来文经文修订了《创世记》和《出埃及记》。

---

① 本文作者曾撰一文讨论中文圣经版本目录的著述概况，参蔡锦图：《新教中文圣经的版本编目研究》，载《建道学刊》31 (2009)，1-24。本文较集中于介绍现存版本的概况，与上文互相补充。

② 本文是笔者近年的研究项目，对于有关历史及整理方式的建议，恳请研究学者赐教，指正不足之处。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伦敦传道会(简称"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在中文圣经翻译历史上更具影响力。1805年马礼逊尚在伦敦时已在广东人容三德的教导下学习中文。他在1807年抵达中国后,立即开始翻译圣经。1810年马礼逊以天主教巴黎外方传教会传教士白日陞(Jean Basset)的译稿为基础,根据希腊文修订《使徒行传》,在广州付梓。[①]1811年及1812年马礼逊分别出版《路加福音》及大部分书信,其他《新约》书卷于1813年完成,1814年在广州出版。最早的《旧约》版本是《创世记》第1章,也在这时出版。另一位伦敦会传教士米怜(William Milne)于1813年抵达澳门,协助马礼逊。他们合作翻译的《旧约》在1819年完成;1823年在马六甲出版全本圣经,共21册,取名《神天圣书》。在马礼逊逝世后的1845年,伦敦会传教士美魏茶(William C.Milne,米怜的儿子)修订了《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在伦敦由英国圣经公会出版。

马礼逊于1834年逝世之后,他的儿子马儒翰(John R. Morrison)和麦都思(Walter H.Medhurst)向英国圣经公会建议了新的中文译经计划,代表了第二代来华传教士努力的开始。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 F.A.Gützlaff)和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 Bridgeman)也参与了这项工作,结果四人于1837年在巴达维亚出版了《新约》,继而在1838至1840年间出版《旧约》,取名《神天新旧遗诏圣书》。麦都思在1830年代初已有译经的尝试,而郭实腊在1830至1840年代也自行译经。到了1853年,洪秀全以基督教名义建立的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同年以郭实腊译本为依据(当时

① 关于白日陞译本的研究,参蔡锦图:《白日陞的中文圣经抄本及其对早期新教中文译经的影响》,载《华神期刊》,第1期,2008年6月,50-77;Francois Barriquand, "First Comprehensive Transl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in Chinese: Fr Jean Basset (1662-1707) and the Scholar John Xu", in *Societas Verbi Divini: Verbum SVD* 49 (2008): 91-119.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郭实腊已逝世)先后出版圣经,但颇多删改。①

《南京条约》签署不久后的1843年8月底至9月初,英美差会的代表在香港召开首次会议,通过成立一个联合各差会的译经委办会,翻译一部有统一译名用语的中文译本,适合香港与其他通商口岸的教会所用。这部译本由各差会团体的代表(委办,Delegates)翻译和审阅,故此称为《委办本》(*Delegates' Version*)。在《委办本》的中国译经助手中,王韬及其父王昌桂最为著名,协助麦都思润饰经文。《委办本》中最早面世的是1850年的四福音书,1852年出版《新约》,1854年出版《旧约》。这部版本在19世纪下半叶通行,也是1894年新教妇女献给慈禧太后贺寿的圣经版本。

《委办本》是19世纪中叶最重要的译经成果,这段时期中文圣经翻译的成果甚丰,其中较重要的是美部会传教士裨治文与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克陛存(Michael S.Culbertson)合译的圣经,于1853年出版《创世记》,1859年出版《新约》,1861至1863年出版《旧约》。

1840年代至60年代之间,浸礼宗(近代称"浸信会")传教士也修订和出版按照浸礼宗译名和原则翻译的版本,参与者先后有粦为仁(William Dean)、高德(Josiah Goddard)、胡德迈(Thomas H. Hudson)和罗尔梯(Edward C.Lord)等。他们或合作,或分别进行,翻译了具有浸礼宗特色的译本。

到了19世纪末,文理译本尚有湛约翰(John Chalmers)和韶泼

① 据所知,太平天国的圣经译本有《旧遗诏圣书》(书题均为原称,下同;《创世记》和《出埃及记》)、《钦定旧遗诏书》(《创世记》至《士师记》;"钦定"是指经过洪秀全批阅的版本)、《钦定旧遗诏圣书》(《创世记》至《士师记》)、《新遗诏圣书》(《马太福音》)、《钦定新遗诏圣书》(《马太福音》至《路加福音》)、《钦定前遗诏圣书》(《新约》;洪秀全在该版中把书名的"新"字批改为"前"字,另有其眉批),此外还有少量分册版本。笔者见过其中5个。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Martin Schaub,另译"韶玛亭"或"沙伯")翻译的《诗篇》(1890)和《新约》(1897),是为《和合本》之前以文理翻译的最后一部完整《新约》。某些传教士也独立翻译了文理福音书、《诗篇》或《新约》书信,供自己所事奉的区域使用。[①]这些单行译本除了在传教士工作的区域外,对其他地区影响甚微。

中国人在中文圣经翻译中大多是协助者角色,[②]但也有较重要的参与。除了上述《委办本》中的王韬之外,理雅各的助手何进善(字福堂)以在《委办本》的《马太福音》(1854)和《马可福音》(1856)中附上注释,由理雅各修订,成为首位重要的参与者。

在晚清众多参与译经工作的中国人中,最著名的学者算是严复。严复于19世纪末被英国圣经公会邀请翻译《马可福音》,只译出前4章,于1908年出版,以通行的文理体裁翻译。这是没有任何外国人协助,直接译自《英语修订译本》(*English Revised Version*)的《新约》卷籍。

2.浅文理译本

由于文理译本只能供少数学者阅读,为了使读者的层面更广泛,但又不会流于过分通俗,传教士以浅白的文言(传教士称为"浅文理")翻译圣经。

最早的浅文理译本是圣公会传教士施约瑟(Samuel I.J.

① 按笔者从目录或图书馆所见,这些单卷文理译本的译者有叔末士(John L. Shuck)、罗孝全(Issachar J.Roberts)、基律(Charles W.Gaillard)、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倪维思(John L.Nevius)、陶锡祈(Samuel Dodd)、尼拿伯格(音译,中文名称,Joseph Anderson Leyenberger)等。

② 最早独自翻译新教圣经译本的中国人是19世纪20年代末两名广东人冯亚生和冯亚学,在德国翻译《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以及路德的《信仰小问答》(*Kleiner Katechismus*)。参 Jost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History of the Union Version or the Culmination of Protestant Missionary Bible Translation in China* (Sankt Augustin – Nettetal: Monumenta Serica, 1999), 125–127。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Schereschewsky)在1880年出版的《诗篇》,译文原本是他所译《公祷书》的一部分。施约瑟于1881年在武汉严重中暑瘫痪,四肢行动不便,向教会请辞,却仍然致力于译经,1898年出版浅文理《新约》,1902年出版整部圣经。他曾计划修订该部译本,以便与他的官话译本统一(参下段),可惜1906年施约瑟逝世时其浅文理圣经的串珠工作尚未完成,由其助手莲英煌负责编写,最后整部浅文理译本串珠在1910年出版。

浅文理译本的主要译者是在汉口传教的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他注目于以较通俗的半文理半白话文体(包括官话和浅文理)翻译圣经,使一般人可以看懂。1883年出版浅文理的《马可福音》,及随后的《约翰福音》、《马太福音》和四福音合刊。1885至1905年间出版了浅文理《新约》全书,继而有《诗篇》和《箴言》、《创世记》和《出埃及记》、《利未记》至《申命记》、直至《雅歌》为止的《旧约》,可惜《旧约》始终没有完整翻译出来。

除了杨格非译本外,还有包尔腾(John S.Burdon)与白汉理(Henry Blodget)以官话译本为蓝本翻译的《马太福音》(1886)和《新约》(1889)。浅文理圣经翻译的最后一次尝试是1928年由中国圣经学者李启荣(Calvin Lee)译成的《新译雅各书》,在广州出版。李启荣在梧州建道圣经学院任教,他根据希腊文原文译出《雅各书》,也为浅文理圣经翻译画上句号。

3.早期官话译本

早期中文圣经译本主要是文理译本,对象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然而,中国教会信徒日渐增加,由于教育水平大多不高的关系,在阅读文理译本时感到困难,以致对官话译本的需求渐增。"官话"在广义上指北方方言,尤其是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话。晚清的官话即是后来的"白话"或"国语",按照使用地区而略有不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

同。早期官话译本主要是指南京官话译本和北京官话译本，不过还有华北官话方言译本，包括山东话、天津话、胶东话和直隶话译本，后者只有少量经卷流传。这里先介绍南京官话译本和北京官话译本，其他官话方言译本留待以下介绍。

新教第一部官话译本是《南京官话译本》，是在麦都思和另一位伦敦会传教士约翰·施敦力（Alexander Stronach）的指导下，由一个中国人按照文理译本翻译的，1854年在上海出版《马太福音》，1857年刊行《新约》，以后多次改版重印。

1861年英国圣经公会建议华北传教士组成委员会，翻译适合华北官话的译本，成员包括包尔腾、艾约瑟（Joseph Edkins）、施约瑟、白汉理和丁韪良（William A.P.Martin）等来自不同差会的传教士。1862年这个委员会在上海出版了一部《马可福音》译本（参考《南京官话译本》），继而出版了福音书和《使徒行传》（1864—1866），并修订了《新约》（1872）。一般称这部译本是《北京官话译本》，它有一个特色，就是出版了三部以不同方式翻译圣号（“神”、“上帝”、“天主”）的版本。1878年英国圣经公会将《北京官话新约全书》与施约瑟的《旧约官话译本》（1874）合并出版，成为在《和合本》之前华北地区流传最广泛的官话译本。

虽然《北京官话译本》流传广泛，英国圣经公会与苏格兰圣经会却认为它的官话带有北方口语，不适合其他地区使用，故此在1887年请求杨格非翻译一部适合华中地区的官话译本。杨格非在其1886年浅文理译本（参上段）的基础上，于1889年由苏格兰圣经会在汉口出版了《新约》官话译本，1893年又出版附有注解的《新约》，加上导言和地图。由于杨格非的译本用语与《北京官话译本》有别，有时亦称为《华中官话译本》。

施约瑟从1887年夏天开始修订官话《旧约》。由于他患病瘫痪后不能执笔，只能把中文字罗马拼音化，用右手的中指，或以拳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头握棒子，在打字机上逐字把修订稿打出来，再翻译成官话译本。1896年出版《新约》修订本，1897年出版《创世记》和《约伯记》，1898年出版《箴言》，更把《北京官话译本》的《新约》与他的《旧约》修订本合并，于1899年出版。同时，他又预备圣经串珠注释的工作。施约瑟逝世之后，他所修订的《北京官话译本新约》与他的《旧约》于1908年一同印行，并附串珠，成为第一部带有串珠的完整圣经版本。

除了上述官话译本，《和合本》之前尚有英国长老会传教士宾为霖（William C.Burns）的《诗篇》附注解（1867）、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的福音书（1867）、文书田（George Owen）修译的《约翰书信》手抄本（1904）、[①]鲍康宁（Frederick W.Baller）以中国传统诗形式翻译的《诗篇》（1908）等单卷版本出版。

4.和合本

到了19世纪下半叶，可供中国教会共同使用的联合译本议案再次成为亟待解决的议题。1890年在上海举行的传教士大会决定，共同翻译出版一部联合译本，称为《和合本》（*Union Version*）。《和合本》计划包括文理、浅文理和官话三种版本。大会成立了三个委员会，负责翻译这三个语体的译本。整项计划涉及西方译经者前后约30多人，经过差不多30年才完成，成为最后一项由西方传教士主导的汉语圣经翻译计划。

20世纪初期中国语文经历了重大变化，白话文体渐渐取代文理文体，故此在《和合本》翻译期间，1907年的传教士会议决定合并文理及浅文理译本，只出版文理和官话版本。《和合本》的文理版本于1919年出版，1923年修订；官话版本于1919年出版全本圣

① 本书似乎没有出版，笔者所见的是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所藏的手抄本。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经。由于《和合本》官话版本受到普遍认可，现今一般通称的《和合本》基本上是指官话（后来改称"国语"）译本。

1919年《和合本》出版之后，即已酝酿着修订。《和合本》最早的修订是在1920年代初，由燕京神学院院长刘廷芳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Stuart）等人组成的小组尝试进行。1926年另有一个《和合本》的保存委员会成立，不过两者都没有具体成果。1958年英美两国的圣经公会同意考虑修订《和合本》，并与中国教会领袖与学者商讨，也没有实质的修订成效。直至80年代初，联合圣经公会先后在香港及新加坡等地举行有关修订《和合本》的研讨会，并着手修订，于1988 年以《新标点和合本圣经》为名出版。

近年对《和合本》最大的修订是联合圣经公会的《和合本修订版》计划。联合圣经公会于1983年先后在香港、台湾及新加坡等地举行有关修订《和合本》的座谈会，随后与各地圣经学者、翻译顾问及编辑人员组成团队，展开修订工作。经过多年努力，2000年完成《新约》初稿，出版《四福音书》和《罗马书》试用本，并交由香港圣经公会负责统筹。2006年香港圣经公会出版了《和合本修订版》的《新约》，2010年出版《旧约》。

5.近代中文圣经

在20世纪，中国教会虽然以《和合本》为主要圣经版本，但在译经工作上却先后有20多个计划，部分计划更翻译了全本圣经。在此首先按时序一并介绍单卷译本，然后再介绍《新约》和全本圣经的译经成果。

1934年，普体德（Gordon Poteat）的《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以国语翻译，附上经文与现代生活关系的注释。

1936年，华西协合大学的外国同工翻译出版了福音书中英文合参本。中文经文主要是基于《和合本》，但在许多地方做出修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改;英文经文是自行翻译的版本,建基于希腊文圣经和8部不同的英文译本。

1939年,郑寿麟与陆亨理(Heinrich Ruck)合译的《国语新旧库译本新约全书》在北平出版。这部译本强调信实原则,译文使用国语。单行本分别有《罗马书》(1933)和《诗篇》(1940),而其《新约》和《诗篇》修订版则于1958年在香港出版。

基督教生活社编译部编撰的《现代语文圣经》(1956)是从菲利普斯(J.B.Phillips)的近代英语《新约》(*The New Testament in English*)翻译的,而非根据希腊文,但没有完成。

1958年一位自号为"蒙恩者"所译的《新约雅各书(国语新翻译)》,由台湾中国主日学协会出版,内文并附注音字母。

1958年毕范宇(Frank Price)和顾敦鍒自行出版《新约试译:保罗致腓利门书》,强调忠实、容易理解和阅读的译文。

1960年菲律宾华侨王福民牧师所译的《雅歌》在香港出版,是英汉对照的版本,兼有文理及白话两种译文。

1960年何赓诗(M.A.Hopkins)所著的《约翰书信》出版,由谢友王翻译。

1964年刘翼凌所译的《新译约翰福音》由香港宣道书局代表芝加哥慕迪出版社(Moody Press)出版。

1966年许干泰的《详译约翰嘉音》在纽约出版,翻译了《约翰福音》,强调严格忠于希腊文。

1967年萧铁笛(Theodore E.Hsiao)在赵世光的修订及协助下以优雅的国语翻译的《新约》,由香港灵粮出版社出版,取名《新译新约全书》,1986年其修订版由日本圣经研究会(横滨)出版。

1972年谢友王翻译的《约翰福音》自行出版。

1976年郭先广试译的《中华基督教信友合用圣经刍稿》分别以语体文和文理文翻译了《箴言》、广训(《传道书》、《训道篇》)和《雅歌》。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

以上都是单卷版本，代表了不同方式的尝试。①

至于《和合本》之后，首先完成全卷《新约》的，是1929年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赛兆祥（Absalom Sydenstricker）翻译的《新约》。赛兆祥是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赛珍珠（Pearl S.Buck）的父亲，曾经参与《和合本》的译经工作，他离开《和合本》计划之后于1913年在上海出版独自翻译的福音书。可惜赛兆祥于1930年9月病逝，其同工朱宝惠独力完成《新约》的修订，修订本于1936年出版。

首位独自翻译完成《新约》的中国基督徒学者，是曾经协助狄考文（Calvin W.Mateer）翻译官话《和合本》的王宣忱（另称"王元德"）。他从1931年开始，根据1916年在伦敦印行的拉丁文原本，参考1901年在纽约印行的英文原本，对照数部中文译本进行译经。《新约》于1933年由青岛中华基督教会出版。

至于首部完全由中国学者翻译的中文圣经译本，则是多年之后的吕振中译本。1946年北平燕京大学宗教学院出版吕振中的《新译新约译本》。吕振中后来迁居香港，1949年修订《新约》，1952年由香港圣书公会出版《新约新译修稿》，最后于1970年完成全本圣经出版。吕振中根据英国牛津大学苏德尔（Alexandar Souter）所编的《新约希腊文圣经翻译》作为《新约》初稿蓝本，强调信实原则，表达原文的意义，并且尽量保持原文的结构，按此翻译成现代国语。吕振中因着圣经翻译的贡献，在1973年获香港大学颁授的荣誉神学博士学位。

---

① 除了上述的单卷圣经外，在英国圣经公会的圣经目录中，还提过在1940年代尚有Hsiao Shun-hua译的福音书，在1939至1940年以小册子方式在天津出版；1965年在台中另有《旧约》和《新约》选辑，由Di Shou Ren译。可惜笔者遍寻不见这两个版本，故此不能确定两位译者的中文名称。关于两者的资料，参 Hubert W.Spillett, *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London: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75), no.525 和 564a。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1970年代，许牧世、骆维仁、周联华、焦明及王成章等翻译的《现代中文译本》，是联合圣经公会以英文《现代英文译本》(*Today's English Version*)作为翻译蓝本，审阅过程却经过仔细与原文校对，运用现代普遍流行的文体，尽可能减少音译词语，以"意义相符，效果相等"的原则翻译而成。《新约》于1975年、《旧约》于1979年完成，1997年出版修订本。

1970年代的另一部译本是《当代圣经》，以美国神学家戴肯尼(Kenneth Taylor)的英文圣经《当代圣经》(*Living Bible*)为蓝本，以浅白易明的文字翻译而成，1974年完成《新约》，取名《当代福音》，1979年完成《旧约》，取名《当代圣经》，以后历经多次修订改版。

《圣经新译本》由美国乐可门基金会(Lockman Foundation)资助，由数十位不同宗派的华人圣经学者自行翻译而成。从1972年组成"中文圣经新译委员会"开始，《新约》于1976年、《旧约》于1992年完成，由天道书楼出版(后由环球圣经公会出版)。

1987年台湾福音书房出版由李常受负责领导翻译的《新约圣经恢复本》，译文保留《和合本》的风格，但吸纳了新的用语，不过只在某些教会传统中使用。

汉语圣经协会(前称"国际圣经协会")在2006年出版的《新普及译本新约》，以浅白流畅的笔触翻译了英文圣经《新普及译本》(*Holy Bible, New Living Translation, NLT*)。

汉语圣经协会尚在进行的中文圣经翻译计划有《新汉语译本》，2010年出版《新约》，《旧约》预期于2014年完成。

以上《新约》或全本圣经的翻译工作主要是在香港和台湾进行的，此外在其他地区也有译经尝试，例如2006年美国凸桑中文圣经协会(Tucson Chinese Bible Society)出版了萧庆松(Gene Hsiao)译的《新译简明圣经》，《新约》已经完成，《旧约》的翻译仍在进行中。

《中文标准译本》是另一部在美国进行的译经项目，由亚洲圣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经协会与霍尔曼圣经出版社(Holman Bible Outreach International,简称HBOI)一起翻译并推出,2008年完成《新约》出版,《旧约》的翻译仍在进行中。

除上述译经成果外,20世纪还有不少中国学者和作家以文学手法翻译个别圣经卷籍。较早期的有许地山的《雅歌》(1921)、吴曙天的《雅歌》(1930)、陈梦家的《歌中之歌》(书题,1932)、李荣芳以《离骚》的文理语体翻译的《哀歌》(1930年代)等。近年有冯象的《摩西五经》(2006)和《智慧书》(2008)。这些作品大多是文学作品,而非供教会使用的典籍。

6.方言译本

虽然中文译本以文理或官话为主要语言,但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文理或官话不大通行的中国东南地区(特别是沿海省份),出现了不少方言译本。除了官话系的少量方言外,以吴语系译本为最多,其次为闽语系、客家语系、粤语系等,合共有20多种。[①]这些方言译本大多只翻译了部分经卷,以汉字印刷,也有以罗马拼音字母译写汉字的译音刊行,部分更是兼具两者。民国以后,另有少量以注音方式印行的版本。

6.1.官话译本

《新约》的官话译本主要以北京官话(后来发展为国语和普通话)为主,但官话也有少量的方言差异。除了南京官话译本和北

① 为了省略篇幅,以下介绍只略提各类方言译本的概况。有关最早版本的出版日期,请参附表。留意以下论述会附上有关语言的英语名称,那是传教士时代的译法,有别于今天的拼音方式。以下介绍的方言译本除了山东话和直隶话译本外,其他所有方言译本的每种语体,笔者都曾看过起码一部以上的版本。然而,笔者承认,由于对每种方言的掌握能力有限,只可以做出基本资料的判别。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京官话译本之外，还有华北官话方言译本，包括山东话(Shantung dialect)、天津话(Tientsin dialect)、胶东话(Kaiotung dialect)和直隶话(Chihli dialect)译本，都是只有少量经卷流传，且附上不同形式的注音系统。

6.2.吴语系译本

吴语也叫江浙话或江南话，通行于江苏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角和安徽南部的部分地区。

吴语中最早用于圣经的方言是《上海话译本》(*Shanghai colloquial*)，通行于上海和江苏省东南方，其译本分为汉字版本和拼音版本。

跟着下来，依次是《宁波话译本》(*Ningpo colloquial*)，通行于浙江省东北部的宁波地区。宁波话译本有汉字版本和罗马拼音文字版本，其中绝大部分是罗马字译本，只有《新约》少数几卷为汉字版本。

《金华话译本》(*Kinhwa colloquial*)通行于浙江省中部金华地区，只有一部以罗马拼音字母排印的译本。

《杭州话译本》(*Hangchow colloquial*)通行于浙江省北部的杭州地区，其译本以汉字或罗马拼音字母排印，还有王照官话字母。①

《苏州话译本》(*Soochow colloquial*)通行于太湖东岸，其译本只有汉字印刷的版本，早期译本大多是根据上海话译本重译的。

《台州话译本》(*Taichow colloquial*)通行于浙江省东部台州湾入口处，其译本是罗马拼音版。

《温州话译本》(*Wenchow colloquial*)通行于浙江省温州地区，其译本以罗马拼音字母排印。

① 王照官话注音系统(Wang-Peill Phonetic System)是清末的一个翰林王照在光绪年间发明的，也称为"官话字母"，后经改良使用，但仅有少量《新约》与单行本圣经采用。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6.3.闽语系译本

"闽"是福建省的简称，但闽语也见于浙江省南部和江西、广西、江苏三省的个别地区，一般对通行于福建省北部和台湾部分地区的称为"闽北话"，通行于福建省南部、广东省潮州汕头一带、海南岛、台湾部分地区的称为"闽南话"。

闽语中最早出版的圣经是厦门话译本(Amoy colloquial)。厦门话在福建省南部和台湾通行，其译本主要是罗马拼音文字版本(近年有台语汉字版本)，既有厦门腔，也有漳州腔。厦门话圣经翻译工作最初在厦门进行，由于台湾地区使用的闽南语(简称"台语")与厦门话十分相近，随着新教传教士在台湾的工作，台语圣经也出现了。故此，对于厦门话译本的研究需要与台语圣经并行。

跟着下来，依次是《福州话译本》(*Foochow colloquial*)，通行于福建省福州地区，其译本分别以汉字、罗马拼音文字(另称"榕腔拼音本")和国语注音字母刊行。

《邵武话译本》(*Shaowu colloquial*)，通行于福建省邵武市，其译本以罗马拼音字母排印。

《兴化话译本》(*Hinghua colloquial*)，通行于福建省，其译本以罗马拼音文字排印。

《建宁话译本》(*Kienning colloquial*)，通行于福建省北部(属于赣方言)，其译本以罗马拼音字母排印。

《建阳话译本》(*Kienyang colloquial*)，也通行于福建省北部，其译本以罗马拼音字母排印。

《汀州话译本》(*Tingchow colloquial*)，通行于福建省汀州府，由于汀州府居住了相当多客家人，故此汀州话实际上结合了官话和客家话的特征，其译本以罗马拼音字母排印。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

6.4.广东地区通行的方言译本

广东地区通行的方言译本包括客家话和粤语两系。客家是汉族的支系，相传于西晋至南宋年间数次南迁中流徙至赣、闽、粤等地，因而被称为“客家”，以别于原地的居民。客家话通行于广东省及邻近地区。至于广州话（通称“广东话”），则属粤语系，通行于广东省地区，亦是海外华人的主要方言之一。

广东地区最早的译经成果是客家话译本（Hakka colloquial），早期主要以罗马拼音文字版本印行，后期以汉字版本印行，译者大多是德国巴色会传教士。台湾圣经公会在1984年成立客家话翻译委员会，开始翻译客家话《新约》，已经陆续出版。客家话译本另有一类，是在广东省东北部地区所用的五经富方言（Wukingfu dialect），主要是罗马拼音版本。

跟着下来是《广东话（广州话）译本》（*Canton colloquial*），大多是用汉字印刷的，只有部分版本使用罗马拼音文字，是迄今仍在出版的方言译本。

《汕头话译本》（*Swatow colloquial*），虽属闽语系，但由于汕头位于广东省东南部，故此可归入广东地区的译本。汕头话译本包括汉字版本和罗马拼音字版本（另称“潮语拼音本”）。

《海南话译本》（*Hainan colloquial*），用于广东省南部的海南岛，都是用罗马拼音文字印刷的。

《三江话译本》（*Sankiang colloquial*），通行于广东省西北部的廉州府，其译本为汉字版本。

6.5.其他地区的方言译本

中国其他地区的方言译本迄今极少发现，只知在地处汉江注入长江口的汉口（Hankow），1921年以王照官话字母翻译了《马可福音》。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

中文各地方言圣经译本概览

语体		体例	最早出版的书卷及年份	最早《新约》出版年份	最早完整圣经出版年份
官话译本	南京官话	汉字	《马太福音》/1854	1857	—
		罗马拼音文字	《路加福音》/1870	—	—
	北京官话	汉字	《马可福音》/1862	1872	1878
	山东话	罗马拼音文字	《路加福音》和《约翰福音》/1892	—	—
	天津话	汉字/注音并排	《新约》经文选篇/1917	—	—
	胶东话	王照官话字母	《马可福音》/1918	—	—
		国语注音文字	《马太福音》/1920	—	—
	直隶话	王照官话字母	《路加福音》/1925		
吴语系译本	上海话	汉字	《约翰福音》/1847	1870	1908
		罗马拼音文字	《约翰福音》/1853	1871	
	宁波话	罗马拼音文字	《路加福音》/1852	1868	1901
		汉字	《约翰福音》/1894	—	—
	金华话	罗马拼音文字	《约翰福音》/1866	—	—
	杭州话	汉字	《新约》选集/1877	—	—
		罗马拼音文字	《约翰福音》/1879	—	—
	苏州话	汉字	福音书和《使徒行传》/1879	1881	1908
	台州话	罗马拼音文字	《马太福音》/1880	1881	1914
	温州话	罗马拼音文字	《马太福音》/1892	1902	—
闽语系译本	厦门话	罗马拼音文字	《约翰福音》/1852	1873	1884
	福州话	汉字	《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1852	1856	1891
		罗马拼音文字	《约翰福音》/1881	1890	1905
		国语注音字母	《马可福音》/1921	—	—
	邵武话	罗马拼音文字	《雅各书》/1891	—	—
	兴化话	罗马拼音文字	《约翰福音》/1892	1900	1912
	建宁话	罗马拼音文字	《马太福音》/1896	1896	—
	建阳话	罗马拼音文字	《马可福音》/1898	—	—
	汀州话	罗马拼音文字	《马太福音》/1919	—	—
	客家话	罗马拼音文字	《马太福音》/1860	—	—
		汉字	《路加福音》/1881	1883	1916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广东地区通行的方言译本	客家话/五经富话	罗马拼音文字	圣经选辑/1910	1916	—
	广东话(广州话)	汉字	《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1862	1877	1894
		罗马拼音文字	《路加福音》/1867	1913	1915
	汕头话	汉字	《路得记》/1875	1898	1922
		罗马拼音文字	《路加福音》/1877	1905	—
	海南话	罗马拼音文字	《马太福音》/1891	—	—
	三江话	汉字	《马太福音》/1904	—	—
其他地区的方言译本	汉口话	王照官话字母	《马可福音》/1921	—	—

二、研究和整理

西方差会的历史档案大多存放在差会或学术机构的档案馆中,在中文圣经馆藏方面也是如此。现今中文圣经的馆藏,以英国剑桥大学圣经公会图书馆所藏为主(馆藏来自英国圣经公会),美国圣经公会图书馆也保存了相当多的版本资料,中国基督教两会、香港和台湾的圣经公会亦有部分可供参考的材料。此外,就是各大学图书馆所藏的档案。

不过,以上档案材料除了少数学术图书馆曾作整理和出版之外,大多仍待研究。近年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部分珍贵的中文圣经版本影像可以通过网上查阅。[①]虽然所见的仍是少数,较罕见的版本仍需在个别图书馆中寻找,但已有助于研究。

① 最重要的是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的网页,另一种是"珍本圣经数位典藏查询系统"的网页。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早期以中文圣经翻译为题的论述大多是对圣经译本的介绍。这类作品是以时序或语言的分类方式，逐一介绍个别译本，但或许部分论述缺乏以原始材料为基础，以致在基本资料上，例如译本的年份和书题，偶有出错，也少有澄清不同版本之间的关系。故此，在整理中文圣经版本这一论题上，首先应从现存档案的资料入手，然后以此为基础，探讨中文圣经翻译的种种论题。

除了一般性的导论著述外，对于中文圣经的研究可以分为三类：中文圣经翻译的历史、中文圣经翻译的理论探讨，以及中文圣经版本的整理（包括版本目录的整理）。以下尝试略述有关研究的情况，以作进一步探讨的参照。

1.中文圣经翻译历史

在19世纪来华传教士的文章中，不乏对中文圣经翻译的简略论述，尤其见于介绍圣经公会工作的作品。到了20世纪初，海外论述中国教会的英语作品也渐见带有这类文章的著述。[①]英国公理会传教士文显理（George H.Bondfield）和马君甫在《中华基督教会年鉴》对中文圣经翻译及发行的介绍，是最早以中文撰述的相关著述。[②]1934年，海恩波（Marshall Broomhall）[③]和贾立言（A.J. Garnier）[④]分别出版英文和中文论著，两者成为最早介绍中文圣经翻译的专著。

---

① 例如，Bertram Wolferstan, *Th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from 1860 to 1907* (London & Edinburgh: Sands & Company, 1909), 42-54, 是较早期对此课题的介绍。

② 参文显理（G.H.Bonfield）、马君甫：《中华圣书译本及发行考》，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2(1914)，107-112。

③ M.Broomhall, *The Bible in China* (Shanghai: China Inland Mission, 1934)；中译本参海恩波：《道在神州：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蔡锦图译，香港：国际圣经协会，2001。

④ 贾立言（A.J.Garnier）：《汉文圣经译本小史》，载密立根（George Milligan）编：《新约圣经流传史》，冯雪冰译，上海：广学会，1934，附录。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以上论述都是较为非学术性的介绍。英国圣经公会[①]和美国圣经公会[②]的报告书刊载了在华传教工作和圣经分发的概况。近年学术界从差会的档案资料，包括工场报告和信函，重新探讨有关课题，这方面情况特别见于对英国圣经公会的馆藏整理。该会历年的报告书就刊载了在华传教工作和圣经分发的概况，可供研究，而成果也不少。

在中国教会历史方面，由于西方学术界相当重视差会的档案资料，故此对于中文圣经版本的研究也渐以传教士的记录、差会和圣经公会的档案为主要资料来源，特别倾向于不同中文圣经版本的比较。施福来(Thor Strandenaes)于1987年的论文是较为系统性的研究，比较了马礼逊的译本、《委办本》、《和合本》、《思高圣经》与《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原则。[③]尤思德(Jost Zetzsche)于1999年研究《和

① 英国圣经公会的年度报告书是 *Reports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with Extracts of Correspondence*。关于英国圣经公会的历史，迄今最详尽的著作是 William Canton,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5 vols. (London: John Murray, 1904, 1910)，介绍该会在19世纪的工作。近年较重要的著作是 Leslie Howsam, *Cheap Bibles: Nineteenth-Century Publishing and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但其中的历史仍然以19世纪为主。至于该会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可参 James M.Roe, *A Histo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05-1954* (London: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65)。

② 美国圣经公会的年度报告书是 *Annual Reports of 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关于美国圣经会的历史著作，较重要的是 Henry O.Dwight, *The Centenni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 2 vols. (New York: Macmillan, 1916)，介绍该会在19世纪的工作。同年，美国圣经会在中国的负责同工海格思(John R.Hykes)撰写了一部小书，介绍该会在中国的译经工作：John R.Hykes, *Translations of the Scriptures into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her Dependencies: Tabulated to December 31, 1915* (New York: American Bible Society, 1916)。

③ Thor Strandenaes, *Principles of Chinese Bible Translation: As Expressed in Five Selected Versions of the New Testament by Mt 5: 1-12 and Col 1* (Ph.D.diss., Uppsala University, 1987). 施福来近年论述中文圣经的论文，尚有 Thor Strandenaes, "Anonymous Bible Translators: Native Literati and the Translation of the Bible into Chinese, 1807-1907", in *Sowing the Word: the Cultural Impact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804-2004*, eds.by Stephen Batalden, Kathleen Cann & John Dean (Sheffield: Sheffield Phoenix, 2004), 121-148，探讨中国人在中文圣经翻译的角色。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合本》的著作是对《和合本》最重要的研究。[①]近年学术界对中文圣经翻译有较多研究成果，包括对个别译本或译经者的探讨。[②]

2.中文圣经翻译理论探讨

第二类作品是关于中文圣经翻译的理论探讨，从而涉及对译经成效的评论。

在中文圣经翻译的理论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有关"译名问题"(Term question，有时也称"圣号问题"，不过后者较窄化于对神圣称号的翻译问题)的论述，这个问题涉及如何用中文称呼希伯来文的"YHWH"和"Elohim"、希腊文的"Theos"、拉丁文的"Deus"或英文的"God"(诸如"Holy Spirit"、"angel"或"baptism"等用语的中文译名，有时也归入这一问题)。圣号如何翻译成为中文，既是语言学或神学问题，也涉及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内涵。不过，在中国教会史中，却是严重的争议论题。[③]

---

① Zetzsche, *The Bible in China*.

② 例如 Chioë Starr, "Reading Christian Scriptures: the Nineteenth-Century Context", in *Reading Christian Scriptures in China* (London: T&T Clark, 2008), 32-48, 探讨19世纪的中文圣经翻译。

③ 对于圣号问题的历史和研究相当多，较重要而已出版的论述参 Samuel Wells Williams, "The Controversy among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n the Proper Translation of the Words God and Spirit into Chinese", in *Bibliotheca Sacra*, XXXV (1878, Oct.), 732-778; George O.Lillegard, *The Chinese Term Question: An Analysis of the Problem and Historical Sketch of the Controversy* (Shanghai: Christian Book Room, 1935, 2nd edition); G.W.Sheppar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ng 'God' into Chinese," in *The Bible Translator* 6.1 (Jan., 1955): 23-30; Douglas G.Spelman, "Christianity in Chinese: The Protestant Term Question", in *Papers o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East Asian Center) 22a (1969): 25-52; Jost Zetzsche, "Tianzhu, Shangdi oder Shen? Zur Entstehung der christlichen chinesischen Terminologie", in *Chun* (*Chinesischunterricht*) 13 (1997): 23-34; 赵维本：《中文圣经译名争论初探：神乎？帝乎？》，载《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第二十四期，1997年7月；Irene Eber, "The Interminable Term Question", Irene Eber et al.(eds.), *Bible in Modern China.The Literary and Intellectual Impact* (Sankt Augustin - Nettetal: Monumenta Serica, 1999), 135-161。近年李炽昌主编：《圣号论衡：晚清〈万国公报〉基督教"圣号论争"文献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书中辑录了1877至1878年间60多篇主要是中国基督徒在《万国公报》发表的争论，注目于中国基督徒的意见和回应。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

另一方面的探讨较为集中于从译者角度分析个别译本所呈现的历史意义。在芸芸研究中，对于马礼逊、郭实腊、施约瑟的译经工作之探讨，为其中最多者。译经者所处的历史语境与他在译经过程中的成果，互为参照。与这一类研究相近的就是对个别译本的探讨，例如《和合本》、天主教传教士白日陞的译本等，还有对个别方言译本整理的论文。

3.中文圣经版本目录

第三类作品是圣经版本的目录或相类的编纂形式。

除了圣经公会与个别差会的报告之外，英国伦敦会传教士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撰写了介绍中文圣经的著作，编写了传教士著作目录，包括中文圣经译本与注释书。[①]在这期间，英国圣经公会和美国圣经公会出版了不同语言的圣经译本编目，包括少量中文译本。其中最重要的编目，是20世纪初由达洛(Thomas H. Darlow)和莫尔(Horace F.Moule)为英国圣经公会整理馆藏的目录。[②]苏佩礼(Hubert W.Spillett)在1967年退休之后回到英国，增订了前书的中文版本部分。[③]

---

① 伟烈亚力从1863年开始任英国圣经公会代理，他对当时基督教书刊的编目(包括中文圣经编目)有 Alexander Wylie,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en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with Copious Indexes* (Shanghae: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Alexander Wylie, *Catalogue of the Chinese Imperial Martime Customs Collection, at the United States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 Philadelphia, 1876* (Shanghai, 1876)。另参 Alexander Wylie, "The Bible in China," in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Nov. & Dec., 1868, 该文后来重印成小册子，在福州出版。

② Thomas H.Darlow & Horace F.Moule, *Historical Catalogue of the Printed Editions of Holy Scripture in the Library of the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2 vols.(London: 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 1903-1911)。上册是英文圣经版本的目录，下册整理及略述600多种语言的圣经版本，包括中文圣经版本。

③ 参 Spillett, *A Catalogue of Scriptures in the Languages of China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

至于美国圣经公会的藏书，诺思(Eric M.North)于1939年出版的编目是最重要的著述，[①]该部目录由奈达(Eugene A.Nida)于1972年增订。[②]

此外还有某些大学图书馆的馆藏。[③]虽然上述目录仍然未能尽录所有的中文圣经版本，却已经充分描绘出早期中文圣经版本的概况。

在馆藏整理上，上述目录都是个别馆藏的编目，不过对于中文圣经版本较完整的整理，现时仍然缺乏。[④]尤其是收录中国教会历史上中文圣经版本的历史、版本目录和提要，然后按语言性质及译本来源(可以是译经者、团队或教会、差会)分类，介绍个别译经历史与圣经版本的著述。

按此取向，中文圣经的编目需待整理的课题，仍然不少。

记得多年前，笔者在德国见过斯洛伐克汉学家高利克(Marián Gálik)教授，恭聆他资深的汉学知识，而他在后来的文章

---

① Eric M.North, ed., *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 Being Some Account of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All or Part of the Holy Scriptures into More Than a Thousand Languages and Dialects with over 1100 Examples from the Text* (London: Pub.for the American Bible society [by] Harper & brothers, 1938).

② Eugene A.Nida, *The Book of a Thousand Tongues* (London: United Bible Societies, 1972).

③ 例如，Christine Lamarre, "Early Hakka corpora held by the Basel Mission Library: an introduction", in *Cahiers de Linguistique - Asie orientale* (Paris), 2002, 31.1: 71-104，介绍瑞士巴色会的馆藏；Basilia Fang, ed., *Sinica-Sammlung der Österreichischen Nationalbibliothek* (Wien: Österreichische Nationalbibliothek, 1992)，是奥地利国家图书馆的中文藏书编目。

④ 以英文圣经译本的编目为例，近年较重要的编目著作是 William J. Chamberlin, *Catalogue of English Bible Translations: a Classified Bibliography of Versions and Editions Including Books, Parts, and Old and New Testament Apocrypha and Apocryphal Books* (Westport: Greenword Press, 1991)。以往的圣经编目著作，大多限于某一图书馆或某一类别的馆藏，但这部编目不仅有主要图书馆的藏书，也包括私人馆藏的项目，共计分为151个类别，每一类别按年份编排。该书的编目结构方式，有助在中文圣经编目上的参考。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中也多次提到对圣经的热爱。[①]这对于笔者而言，是十分重要的提醒。笔者仍然记得，第一次在剑桥大学圣经公会图书馆借阅马礼逊译于1810年的《使徒行传》时，翻开那部以线装木刻、书名页以黄纸印刷、只有百多页的书，便为书中《序言》和译文所感动的感觉，那是热爱和期盼的结合。以后在许多地方，翻阅了历史上不同时期的圣经译本，相同的感觉一次又一次地浮现。中文圣经译本和版本的整理是尚待进行的领域，其间对于中文圣经的欣赏和热爱是进行这项研究的动力来源。

作者蔡锦图，香港信义宗神学院神学博士，香港圣经公会翻译及事工主任。主要从事圣经翻译及中国教会历史研究，发表论文多篇，编撰有《戴德生及中国内地会，1853—1952》、《圣经及教会历史地图集》等，译著有《道在神州——圣经在中国的翻译与流传》、《宗教改革运动思潮》、《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圣经点与线》、《圣经与近代中国》等。

① 参 Marián Gálik, "Epilogue", in *Influence, Translation, and Parallels: Selected Studies on the Bible in China* (Sankt Augustin – Steyler Verlag, Nettetal: Monumenta Serica Institute, 2004), 327–331。

© 1994-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